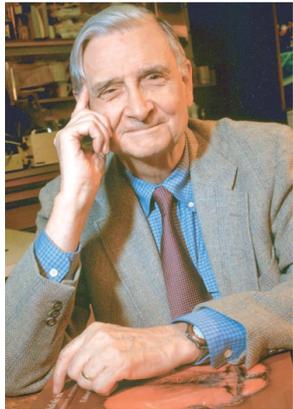


“博物无人继昔贤”

刘华杰



爱德华·O. 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 1929-2021)

2021年12月25日，著名保护生物学家洛夫乔伊(Thomas E. Lovejoy, 1941-2021)和最能讲故事的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2021)去世。27日下午，从“三叠纪”微信朋友圈读到消息，当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 Wilson, 1929-2021)于26日去世。真不敢相信，这些天是怎样的日子？

威尔逊是我们这个时代博物学的符号和见证。他在《博物学在！》立即想到杨时的一句话：“清江渺渺绿浮天，博物无人继昔贤。”西方博物学从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老普林尼、格罗纳，到培根、G.怀特、布丰、林奈、康德、达尔文、梭罗、华莱士、J.赫胥黎、迈尔、劳伦茨、S.古尔德，构成一个连绵不绝的学人链条，“博物学传统”对人类认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下顽强地平衡着还原论强势传统。这些大贤早就谢世，现在威尔逊也走了，面对复杂的世界和条块分割的学术，谁来弥合分裂，谁来指引刚有复兴迹象的博物学文化走向？

胸怀远大，深入“敌营”

美国科学史家、曾任科学史学会主席的法伯(Paul L. Farber, 也在2021年去世)在《探寻自然的秩序：从林奈到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最后一章“作为通才的博物学家威尔逊”中简要描述了威尔逊的贡献，比如：跨越组织层次考察生物种群、拯救生物多样性、与麦克阿瑟合作研究岛屿生物地理学、沟通数理和还原论传统与博物学传统、将达尔文的演化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提出社会生物学的设想、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作为一名资深博物学家，他也时常被误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博物学传统的伟大捍卫者的威尔逊，却帮助发展了否定博物学价值的研究”(法伯，第134页)。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遭受普遍误解，有示威者用高音喇叭叫喊，要求他辞职。1978年受教等级文化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的邀请，威尔逊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发表演讲。不但有七八人举标语抗议，还有一名年轻女子跳上台往威尔逊头上泼水，高呼“威尔逊，你脑袋进水了！(Wilson, you're all wet)”。威尔逊忍受着，保持了应有的风度，没有要求那女子离场，更没有报警。威尔逊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两位同事、左派学者古尔德和路翁亭(Richard C. Lewontin, 1929-2021)甚至也极力反对威尔逊。从更宏大的尺度看，也许路翁亭反对“还原论”有道理，但他表现得有些冒进、挑剔。路翁亭某种意义上是“哲人科学家”，举止充满了批判性，而威尔逊是“博物科学家”，表现得宽容、更务实。

几十年过去，时间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威尔逊非凡之处恰在于视野广阔、见解独到，他努力吸收对立阵营还原论的新成果为己所用。他并没有遗忘、消灭自己的博物学立场，反而沿着布丰、康德之路，把极具包容性的博物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威尔逊是少有的能够“深入敌营”的勇士，就如数学家曼德尔勃罗特(B.B. Mandelbrot, 1924-2010)能够欣赏汤普森(D'Arcy W. Thompson, 1860-1948)，从博物学阵营汲取营养从而提出分形概念，推动了复杂性研究一般。

在这个时代，能够坚持作为博物学家、把自传的书名确定为《博物学家》就已属不易，又能向“敌人”学习用来改进自身学科，可谓难上加难。威尔逊可谓亚里士多德以来把自然主义贯彻到底的最坚定学者。巧的是，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与博物学家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威尔逊没有背叛博物学，“在我心底，我终身都是名探险博物学家。”(In my heart I will be an explorer naturalist until I die)《博物学家》，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445页)

在《创世记》中，威尔逊说：“社会生物学研究融合了博物学和遗传学”(《创世记》，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93页)，对群体选择过程的解释，要以博物学观察和实验室研究为基础(第98页)。这个总结并无太大新意，只不过重复了F.培根(1561-1626)近代早期关于学术改革的呼声。培根用的拉丁词组为historia naturalis et experimentalis，翻译成英语为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培根呼吁通过博物学(对应于自然的探究)和新兴起的实验研究，而抵达真正的学术“natural philosophy”。

从培根算起，四百多年后，人类获得基本知识的手法并没有改变。培根讲了俩事，可否删除一个或一

个完全代表两者？不可以！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博物学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实验研究人们都很重视，不需要再额外强调。前者关注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宏观视野和成功标准，后者追求深度，揭示背后规则，保证限定条件下现象的可重复性。归纳与演绎、猜想与反驳在其中交叉进行，畅行无阻。

“人类世”三部曲

威尔逊著作等身，除了较专门的蚂蚁专著和论文之外，大部分都界面友好，可读性强。如果没时间细读他的所有作品，又急着得到操作指南，建议阅读《半个地球》和《创世记》这两部最近出版的“小册子”。

其中前者是威尔逊“人类世”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人类世”是从地质学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地质学中还没有完全确立，或者说还有争议，但其他领域的学者已经迫不及待地采用它来叙述问题了。威尔逊也不例外。三部曲第一部为《对地球的社会征服》，大意说人这个物种借助其罕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完成对大自然的征服。第二部《人类存在的含义》叙述人类是环境中的一个自然物种，但创造了新的环境，可悲的是，人的肉体和精神均无法很好地适应新环境。在人类世中，人这个物种的适应性非常差。第三部《半个地球》则坦言，人类应当把行星表面的一半交还大自然，只有这样做未来才有希望。为什么一半而不是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一方面有生态保育上的考虑，一方面有心理层面的考虑。保育的窗口正在关闭中，如果不抓住机会，可能陷入万劫不复境地。

“半个地球”，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口号，是科学也是政治。这一观点，体现了威尔逊特有的智慧：表面模糊，但定性上准确，便于公众理解。在实际操作中它暗示人们开发利用大自然，要留有余地；留多少？至少留一半！这一原则应当还原论地层层加以落实，以确保整个盖亚生态系统处于安全状态。

在《半个地球》的结尾处，威尔逊总结道：“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不要再继续伤害生物圈。”伤害自己生存的环境？作为理性的动物，怎么会走到这地步？除人以外还有别的物种如此无知、放肆、道德败坏？没有。对人而言，一切皆以文明、科学、理性进步的名义进行，结果却走向反面。这表明，过去长久坚信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人类要对自己的道德观念进行一次大调整，要对其他生命形式许下郑重承诺，要保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荒野。荒野没了，人类历史也就终结了。不过，威尔逊也提醒，此时不要迷恋不靠谱的宗教信条，也不要陷于无聊的哲学论争。哲学并非没有用。要通过博物实践、科学研究归纳出基本的伦理信念。如果“自私的基因”可以成立的话，利他主义也是人的一项本能。对“博物者”(中国古代就有这一概念，它对应于naturalist)，这并不是什么全新的思想，达尔文就有这样的想法，民间谚语也与此呼应。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已经清晰论述了组织与道德的力量，威尔逊相信前辈的远见。

“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

威尔逊成名后，深受读者喜爱，笔法愈加成熟老练、富有创意。

在《论融合：知识的统合》中，他讨论启蒙运动、科学兴起，从基因到文化，从社会科学到艺术阐释，一直讨论到伦理和宗教。威尔逊明确拒斥康德、摩尔、罗尔斯之哲学的先验成分，他们是因为不知道现代生物学和实验心理学才提出那样的观点。威尔逊驾轻就熟地评论怀疑论，“自然

主义谬误”关于“是”与“应当”的不可能推演。他进一步犀利地指出，宗教从它的主要盟友“部落主义”那里汲取力量，甚至许多宗教也是通过自然选择演化出来的。

在《生命的未来》中，他虚拟了与梭罗的通信，他站在那儿，只为了一个目的：“成为一名彻底的梭罗信徒”：“我们跨越150年直接交流，这是不是很奇怪呢？我倒并不认为。如果主题是博物学，这种方式也就不奇怪了。”“梭罗，一名彻头彻尾的博物学家，你应该喜欢这个生物多样性日(Biodiversity Day)，这是我们为了纪念你而在最近举行的。”(《生命的未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7-8页)在论及遗传工程时，威尔逊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如何在养活数十亿新增人口的同时，也能够拯救其他生命，而不会陷入威胁其自由与安全的类似‘浮士德交易’的陷阱中。”(《生命的未来》，第142页)

威尔逊的专业领域是蚂蚁，一类小小的昆虫，一生中他描述了四百多个新类群。在《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中，威尔逊说蚂蚁在一亿多年前就出现了，1966年已经找到9000万年前的蚂蚁化石，它们完好地保存在琥珀中。蚂蚁小得可怜，似乎不值得为其奉献一生，但是地球上蚂蚁的总重量大约与全人类的体重相当，因为它们多极了。威尔逊不但描述了新种及其生态，还研究了昆虫信息素，开启了全新的科学领域。

他怎么会对人以外的其他小动物感兴趣？一切的一切可以上溯到美国佛罗里达天堂海滩那个少年。七岁的威尔逊凝视水中的大西洋棘水母，端详着它。从这个少年的专注，可以设想博物学家是如何诞生的。“在关键时刻获取丰富的实践经验，而非理论知识，才是造就博物学家的重要因素。所以说，最好先当个野人，什么学名、解剖学知识，都不知道也不要紧，最好能先花上大量时间去随意探索和做梦。”(《博物学家》，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11页)这当然不是威尔逊一个人的看法，海洋生物学家、《寂静的春天》作者卡森也非常认同这一点，她说童年时光是培育感情和感觉沃土的大好时期，而种子将从沃土中长出。

还是在天堂海滩，威尔逊因为钓上的一条鱼的背鳍扎坏了右眼，后来又影响了听力，这些似乎注定了他不

可能成为博物学家，但事实上这些仅仅限制了一些可能性。1940年，威尔逊11岁，小学老师在致家长长信中说：“威尔逊颇具写作天赋，而且当他把这种天赋和他广博的昆虫知识结合起来时，能够创造出极佳成果。”(《博物学家》第70页)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威尔逊迷上了蚂蚁。从后向前看，这位小学五年级教师简直神预测！写作、蚂蚁、成果！就写作而言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算是一个证明，就蚂蚁研究而言，他是世界头号选手。

按照这个路线，1943年，14岁的威尔逊受邀担任童子军夏令营的博物学顾问，“当年心中只有博物学”(《博物学家》第97页)。1945年，快要上大学时，威尔逊觉得必须严肃面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对昆虫的热爱是有无疑的，但是研究哪类昆虫呢？“我不考虑蝴蝶，它们太有名了。”斟酌再三，他决定研究亚拉巴马州的蚂蚁。这一选择得到国家自然博物馆蚂蚁专家史密斯的肯定。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1952年威尔逊与好友艾斯纳把整个暑假用来研究昆虫。他们开着十年前出厂的老雪佛兰，从麻省朝北向南安大路开去，横越北美大草原上的几个州，来到蒙大拿及爱达荷，再从那里到达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然后沿海岸返回学校。他们俩“好似博物学游牧”，生活在世界边缘。此次考察，他们目睹了北美洲主要的生态系统，奠定其野外生物学的终生热情。1953年威尔逊成为幸运儿，获得研究生特别奖励金，借助此资助他终于有机会前往古巴考察。之后，成功之路无法阻挡。1955年威尔逊从哈佛大学毕业，担任助理教授，1958年接到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职(副教授)聘请，但是最终还是受聘母校哈佛大学终身教职，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哈佛。

是什么成就了当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威尔逊？是好奇心，是对昆虫的无尽兴趣。看着他的传记，他写的每一部书，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天堂海滩盯着水母的那个小孩。安德森说：“我们生来都是博物学家，随后的发展取决于每个人的机会、环境和境遇。”博物学家？词太广，承受不了，“博物者”可能更合适，人人都有博物潜质。想一想，是谁是什么让我们遗忘了博物学，变得对大自然冷漠？

2021.12.28



圣乔治与龙

(油画)

丁托列托 [意大利]



序跋精粹

科幻研究和重写文学史

读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

宋明炜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异军突起，这是当代中国文坛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在短短十年间，科幻从“寂寞的伏兵”，变成流行文化的前锋，对于研究者和批评者，提出了重要的议题。作为类型小说的科幻，其实比其他文类更具向心凝聚力，科幻批评也有其传统，立足科幻圈内自成一统。另一方面，科幻的历史、文类和诗学诸问题，以及从中延伸出来的生态、技术、乌托邦、后人类等理论问题，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文学研究界所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科幻研究(与数字媒体、人工智能问题)由此可能正在促成学术领域的范式转变。也就是说，在科幻小说挑战文学传统的同时，有关科幻的探讨也在打开文学研究新的思考面向。

詹玲的这部新著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即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面对科幻带来的挑战，不仅仅对科幻小说做出恰当的评论，也是从科幻出发来重新调整文学研究的格局。在学科意义上，科幻不仅作为一个对象具有研究价值，而且科幻引发的思考，促使学者重写文学史：“包括科幻在内的”文学史。

詹玲与科幻圈内成长起来的批评家所共有的，是对于科幻的兴趣，但詹玲也是出身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者，比如她此前对于历史小说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她的学术眼光。最早把她引向科幻研究的，其实正是科幻小说中的历史话题；而关注科幻小说与历史小说之间的关联，使她一开始就把科幻研究联系到文学史的反思中。在她最终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的绪论中，她直接描述了这样一种开放性、历史化的科幻研究的意义：“尝试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放入整个当代中国小说史甚至文学史的框架下，将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发展的组成部分”。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最初的科幻研究者往往重视晚清和当代这两头。从晚清研究中发生的对于晚清文类的研究，吸引不少学者在思想史、科学史的框架内考察晚清“科学小说”的起源和发展。近十年来，特别是在刘慈欣等人的代表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的场域之后，则有许许多多当代政治学与理论学出发的科幻批评，以及由此展开在哲学和诗学层面的阐释。詹玲则将晚清科学小说与当代科幻新浪潮置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中，她对种种当代议题(如科文之争、民族和传统资源)加以历史化处理，并以详细的历史资料，写成了一部当代科幻文学史。

贯穿于这部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考察科幻在科普任务和文学自觉之间的曲折道路，这其实也是书的标题所指涉的“转型”的意义。詹玲的研究，将科幻小说从上世纪初诞生时就兼有的“开民智”科学启蒙与文学现代性这双重命题做出辩证的梳理。她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科幻小说的主要任务曾一度是宣扬技术理想，但当时“旁逸斜出”的文学性尝试为科幻小说在八十年代再度兴起之后的转型已经埋下线索。改革开放初期昙花一现的科幻热，纠结于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虽然在人性表达和通俗化的层面呈现出文学性转向，却并未完成转型。直到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个文类再度兴起，随着各种外部、内部条件的成熟，中国科幻才充分实现了将文学性和科学性充分结合的转型。

对于当代科幻小说转型过程中许多具体现象和作品的分析，都显示出詹玲的研究一直并未离开最近二十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即人文精神的思辨。比如她分析韩松《宇宙墓碑》时所做的一些判断：韩松描绘的主题是技术和人文的冲突，人类以人定胜天的傲慢，进行宇宙大开发，修建纪念碑一般的宇宙墓碑，却完全背离人的生活；只有“那个通晓了此在生存的本真状态的小墓主人，学会了与宇宙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的道理，修筑了与宇宙声气相通的小墓，终得以诗意地栖居于宇宙之间”。我此前还没有看到有像詹玲这样清晰明了地解析韩松技术美学、韩松、王晋康、刘慈欣以及陈楸帆等几代科幻人，分析的作品囊括《三体》《浪潮》《银河之心》这些重要长篇，以及数以百计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是，科幻批评融合在文学史的整体描述中，这为理解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脉络。

我最初了解詹玲的研究兴趣，是几年前她在哈佛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时。我最初阅读的她的论文，就是从历史题材的科幻入手，探索中国科幻在本土化、民族性方面发展出来的特色。此后，在国内外的多次会议上，我陆续了解她更多的课题兴趣。三年前，她在杭州主办了一次精彩的中国科幻转型研究会议，并邀请我参加。无论在学术交流，还是个人研究方面，我都佩服詹玲的扎实作风。2020年疫情期间，她完成了这部厚重的著作，我两度阅读全稿，认为她这本书在当前的科幻研究中具有坐标意义，所以写下这篇序言，向科幻界、以及更广泛的文学研究界的朋友们推荐詹玲的新作。

出这些作品展现的“后人类”远景对文学所依据的人文精神的挑战，而且去思考“如何写出身份破碎、重组之后的人类社会情状，以及新人文主义可能的价值倾向”。

詹玲著作的另一个优势，是她对各种新异的思路中，总会发现来自传统和历史的出处或影响，这中间有些洞见受惠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格。比如在分析《三体》时指出这部太空史诗的情节中体现出反特/谍战模式，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在十七年和新时期文学方面全面深入研究的功底。这一判断将《三体》文体和情节构造方式的许多特征，放在了文学史长线的考察之中，从中看出科幻转型所体现的文学性和文学通俗化两重倾向，都有更深远的文学史线索。更重要的整体性判断，则来自詹玲对中国历史题材科幻小说的分析，在这一部分，她实际上对科幻所具有的全球化文类与民族国家书写这两重属性做出了更多植根于中国语境的阐释。詹玲对从童恩正到燕垒生、荒、宝树几代作家笔下的民族历史主题的分析，不仅是提炼出中国当代科幻在整体上具有的“本土化、民族化”的主题倾向，而且更是对中国式科幻书写方式的总结。这也正是从历史化思维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科幻的中国性”这个人们时常提出的问题。

詹玲这部新著分成上下两编。上编对中国科幻小说做出纵向的历史梳理，其中第四章分别论述十七年科幻“科普化”的第一次转型、改革开放初期纠结于“文”“科”之争的第二次转型、世纪末酝酿第三次转型的沉寂期，以及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科幻新浪潮体现出来的第三次转型。下编则是横向展开三个重要科幻主题的论述，分别是历史书写与本土传统对科幻的影响、赛博格后人类主题对科幻人本主题的挑战、太空史诗为当代科幻开拓的美学空间。詹玲讨论的作家包括从郑文光、童恩正到吴岩、韩松、王晋康、刘慈欣以及陈楸帆等几代科幻人，分析的作品囊括《三体》《浪潮》《银河之心》这些重要长篇，以及数以百计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是，科幻批评融合在文学史的整体描述中，这为理解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脉络。

我最初了解詹玲的研究兴趣，是几年前她在哈佛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时。我最初阅读的她的论文，就是从历史题材的科幻入手，探索中国科幻在本土化、民族性方面发展出来的特色。此后，在国内外的多次会议上，我陆续了解她更多的课题兴趣。三年前，她在杭州主办了一次精彩的中国科幻转型研究会议，并邀请我参加。无论在学术交流，还是个人研究方面，我都佩服詹玲的扎实作风。2020年疫情期间，她完成了这部厚重的著作，我两度阅读全稿，认为她这本书在当前的科幻研究中具有坐标意义，所以写下这篇序言，向科幻界、以及更广泛的文学研究界的朋友们推荐詹玲的新作。

2021年4月5日 波士顿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